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书系

杨秀昭 苏沙宁
楚 卓 卢克刚 著

广西特色器乐

GUANG XI TE SE QI YUE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书系

杨秀昭 苏沙宁 著
楚 阳 卢克刚 著

广西特色器乐

GUANG XI TE SE QI YU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特色器乐/杨秀昭 苏沙宁 楚卓 卢克刚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1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书系·1-6)

ISBN 7-5059-5461-X

I . 广… II . 杨… III . 民族器乐—简介—广西 IV . J63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076 号

书名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书系 (1-6)
编者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仲小川
责任校对	黄大岗 等
责任印制	彭旭东 仲小川
印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4
插页	18 页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5461-X
总定价	16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ep.com>



芦笙合奏



苗族展青角双奏



侗族牛腿琴独奏



苗族卡谁独奏



苗族三弦独奏



京族独弦琴独奏



贝咯卡展莱芭哈丁独奏



壮族洞咪笛独奏

舟欧双奏



白裤瑶铜鼓合奏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系列丛书

主 编 杨秀昭

副主编 卢克刚 黄志豪

编者的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还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1 个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总计 1834.3 万多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 38.3%。勤劳智勇的广西少数民族人民，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浩如烟海、灿若星群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音乐以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裁新奇、曲调美妙、风格独特、色彩绚丽而尤为突出。有史以来，这些光耀夺目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就像纽带般维系着各民族的世代繁衍生息，规范整合着各民族的共同心理；像面明镜一样折射出各民族的古貌遗风，铭记着历史的每一步足迹。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广西各族民间的传统意识、信仰观念、风情习俗和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融民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祭祀仪式等于一体，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财产。

面对这些稀世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财产，音乐学者赋予满腔热情。上世纪 50 年代初，即开始对之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以方暨绅的《侗、僮、布依、瑶各族民间合唱的基本特征》（载《人民音乐》1960 年第 3 期）为标志，撩开了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神秘面纱。其后，广西艺术学院在 1963 年组织了上百人的采风队，重点采集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 14 个县的民族民间艺术，收集、整理了一大批包括图文和录音在内

的宝贵资料。到 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热潮如火如荼，研究队伍空前壮大，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尤以少数民族音乐基础理论和乐器学研究的成果为甚。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比起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实际存在，还相差甚远，还有很多领域尚未触及，还有很多课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特别令人揪心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等等的急剧转变，这些传承于民间口头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却逐渐衰退，或辗转流轶，或人亡艺残，或后继无人，正濒临消亡的危险。因而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刻不容缓。这是一件上对得起古人，下对得起来者，现在对得起当代人的大事！否则，人类历史上那些无法弥补的文明遗失必将在我们这一代重演，铸成永久的遗憾！

可喜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广西艺术学院的领导高瞻远瞩，适时地组建了广西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研究中心，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全面系统地规划研究课题，着手编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系列丛书”。这项工程的意义，一是透过民间音乐文化的展示，可清晰地认知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增强其自我意识和认同感，振奋民族精神，引导各族人民更加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努力奋斗；二是通过对民族民间音乐发展轨迹的探讨，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分析总结广西各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底蕴，为消除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启示；三是为继承和弘扬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优秀传统提供真实的确凿依据，从而促进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繁荣祖

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四是广西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很多民族有同源异流的密切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知广西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广西各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广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当前，广西各族人民在党的带领下正在努力建设“文化广西”，解读“文化广西”，其要旨当然是文化要有广西特色。那么，何谓广西特色，怎样建设呢？显然，它应当在广西传统文化（包括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出新、发展，才有可能建设成具有广西特色的文化，“文化广西”才可能璀璨夺目，独放异彩。我们真诚希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系列丛书”在建设“文化广西”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中显示出它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杨秀昭

2006年8月15日

地域音乐文化的现代探索

——序《广西特色器乐》

冯光钰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音乐艺术中，器乐和声乐是自成体系的两大系统。将两者比较，相对而言，无论是品种的多样，音域的宽广，还是音乐的多彩、音律的多变，器乐都比声乐更为丰富。吕骥老曾在《〈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序》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器乐占有更大的比重。因为器乐所用的乐器在音色上远比声乐丰富得多，而且声乐在许多情况下常离不开乐器伴奏，而器乐除了不同的乐器独奏外，还有各种不同组合、规模大小不同的乐队合奏”。^① 器乐的这些特点，在杨秀昭、苏沙宁、楚卓、卢克刚合著的《广西特色器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观。

从《广西特色器乐》这部关于地域音乐文化的现代探索的学术著作中可以看出，器乐是人类最早拥有的文明财富之一，也是音乐文化萌发的一个明显标志。在我国，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传统乐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史前，其种类十分多样，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藏。仅从广西的40多种特色乐器及其音乐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广西乃至中国音乐史的发展线索。据杨秀昭教授等学者的考证，广西特色乐器的发展历史脉络可归纳为秦汉兴起的青铜乐器、唐宋兴起

^① 《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1页，漓江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

的笙类乐器、明清以来出现的竹制乐器和弦鸣乐器。可谓历史悠久、形式多样、风韵各异、特色鲜明。

广西众多特色乐器及其音乐鲜明的地方风韵，产生于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地域文化的元素浸透了这些特色乐器的每个个体和它们的音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文化。地域的差异带来文化的差异，亦带来音乐的不同。包括器乐在内的地域音乐特色的艺术构成，包含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以乐器而言，表层如乐器形成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风土人情；深层如乐器制作者和演奏者独特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及音乐表达等。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深层方面是主要的，是需器乐家下功夫挖掘的，而表层方面则较易发现，关键在于器乐家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广西特色器乐》的优长之处在于对广西诸多特色乐器及其音乐的研究，不仅再现了产生这些乐器的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而且对创造特色乐器及创作乐曲的制作师及音乐家特有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进而展现出广西特色器乐独特的发展轨迹，深厚的地域文化背景。

对广西特色器乐的全景式的把握，熟悉和理解音乐的地域环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过：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域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①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地域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② 可以说，古今中外各个地域显示出不同的音乐文化特征，均有各地域不同的音乐基因，由此展现出不同地域的不同音乐面貌，充分地表明地域环境是“主要特征”和“重要因素。”广西众多特色器乐形成的独特的

^① ^②《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

6 广西特色器乐

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就是明证。在广西特色器乐中，不论是本土创造的乐器及其音乐，还是改造外来的乐器及其音乐，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均存在互相借鉴吸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情况，但各民族、各地区都意识到，在吸取他人之长时，决不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必须保持本土乐器及其音乐的鲜明特色，愈是地域性的就愈是富有全国性的，也愈是世界性的，这才可能在乐苑中独树一帜。

在写法和体例上，《广西特色器乐》也是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其研究范围的广博系统，研究视角的多方位，研究方法的多样创新，都聚焦于说明和论述广西特色器乐的“特色”在哪里？全书从个案解剖到整体建构，既体现出以丰富的田野调查实践为基础，又有对各种特色器乐的历史渊源、沿革演变、流传现状、制作材料、形制结构、制作工艺、发声原理、音质音色、律制特点、音列音阶、演奏方式、演奏技法、演奏曲目、曲目来源、习用场合、文化内涵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姐妹艺术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以其翔实的地域文化背景资料，宏阔的学术视野，填补了特色器乐研究的空白，为少数民族器乐研究开出了新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特色器乐》不仅把诸多特色器乐作为各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成果加以展现，而且贯穿着社会文化视角的科学的研究；对各种传统特色乐器及其音乐进行观照，并置于今天的视野之中加以研究，力求通过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探寻各民族特色器乐在现代的改良与推广，传承与发展走向。这种对特色器乐的现代探讨是颇富前瞻性的。

（此序作者为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常务书记）

导　　言

顾名思义，广西特色器乐，指的是流传于广西各地的色彩独特的民间器乐曲。所谓色彩独特，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演奏这些乐曲的乐器独特，即这些乐器在形制结构、制作材料、制作工艺、音质、音色、音律、音列、演奏技法和表现性能等方面不同于众，具有自己独特的色彩；二是这些乐曲本身的调式调性、节奏律动、旋律运行及其发展手法、结构原则及其类型以及这一切形成的风格韵味等等与众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特色彩。不言而喻，这些乐器与乐曲是广西各民族人民群众在其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按照自己的物质条件、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集体创造，具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音乐形态特征。这些生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乐器与乐曲深深地扎根在广西各民族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属地地道道的原生态民间音乐。这些，就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至于专业人员创作的民族民间乐器演奏的器乐曲，比如骨胡独奏曲《壮乡春早》，尽管民族风格非常浓郁，但它不是民间音乐的原生态，而是再生态，不属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乐器与器乐的研究在我国历来是个薄弱环节，广西也不例外，尤其是广西特色乐器与器乐的研究，起步更晚。20世纪60年代初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

广西艺术学院共同组织的民间艺术采风队，在对少数民族聚居的 14 个山区县的民族民间艺术的采录中，开始接触到一些民族民间乐器。比如《那坡县民间音乐采风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音乐采风队编 1964），就收录有彝族铜鼓、葫芦笙（原稿写成“五笙”）、四音笛、“卡谁”等乐器的资料及其演奏的乐曲。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良好的开端未能继续深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的杨秀昭、何洪、卢克刚等同志，才又接过前辈留下的接力棒，开始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和研究广西民族民间乐器及其器乐。他们冒着酷暑严寒，跋山涉水，跑遍广西及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村村寨寨，历经十个春秋，终于收取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音、像、图、文、谱俱全，相互支持。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学者，或是自己的研究课题涉及到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或是自己所在地区的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特色鲜明突出，也从不同角度介入民族民间特色乐器及其音乐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民间音乐的综合性研究涉及到广西特色乐器及其音乐。比如《中国音乐词典》（缪天瑞等主编 1984）、《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殷海山等主编 1991），均系统地列有广西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相关词条，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广西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包括其特色乐器及其音乐）的相关特征。鉴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音乐分支”是由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负责（杨秀昭任主编，龙明洪、卢克刚、何洪任副主编），有关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与器乐的词条诠释相当详尽。再如《壮族音乐》（范西姆 1982）、《壮族音乐》（冯明洋、范西姆、李学伦 1989）、《壮族音乐鸟瞰》（杨秀昭 2000）、《壮族传统音乐》（范西姆 2001）、《瑶族音乐概述》（陆炳兰

1983)、《瑶族音乐》(费师逊、陆炳兰 1989)、《瑶族传统音乐》(费师逊、陆炳兰 2001)、《仫佬族音乐》(周建明、王汉光 1989)、《仫佬族传统音乐》(周建明、王汉光、田联韬 2001)、《毛南族音乐》(张梅、邓如金 1989)、《毛南族传统音乐》(张梅、邓如金 2001)、《京族音乐》(杨平修、庞国权、苏维光 1989)、《京族音乐》(卢克刚 1999)、《京族传统音乐》(杨平修、庞国权 2001)、《壮侗语族音乐三题》(杨秀昭 1996)、《壮侗语各民族音乐文化论纲》(杨秀昭 1996) 等, 在综合性研究广西某一民族或某几个民族的民间音乐时, 也涉及到相关的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某些层面。

二是其他音乐品种的研究中涉及到广西特色乐器及其音乐的研究。比如《采风学习与继承创新——对壮族蜂鼓的采风及创作蜂鼓新曲目札记》(蔡世贤 1998)、《侗族曲艺的艺术特色》(过伟 1992), 研究的主体是曲艺音乐, 却又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蜂鼓、侗琵琶等民间乐器。再如《壮剧艺术研究》(韦苇、向凡 1990)、《广西河池市壮族傩戏音乐考》(陈恒芳 1997) 等, 在民间戏剧音乐的研究中论及了壮族一些主要的民间乐器。还有, 《壮族师公舞打击乐的艺术机能》(钟泽骐 1989)、《瑶族祭祀音乐论》(傅湘仙 1992)、《毛南族傩舞“条套”的音乐浅析》(何佳辉 1992)、《瑶族宗教祭祀活动中的歌舞音乐》(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傅湘仙 1994)、《壮族天乐研究》(何洪 1997)、《京族唱哈祭仪及其音乐研究》(卢克刚 1997)、《汪甸壮族丧俗音乐实录》(韦玉林 1998)、《毛南族丧俗音乐活动实录》(杨秀昭 1999)、《白裤瑶丧葬音乐活动记实》(何洪 1999)、《图腾崇拜·蚂拐节·蚂拐歌会——壮族“蚂拐节”祭仪及其音乐特征》(卢克刚 1999)、《坳瑶“盘王节”祭仪音乐述论》(陈坤鹏 1999)、《原始祭仪中的天籁之音——

壮族（布偏）“天乐”研究》（孙航 2002）、《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大板瑶度身仪式音乐初探》（左志坚 2006）、《白裤瑶葬仪中的铜鼓乐》（郭永青 2006）等等，是在宗教音乐的研究中涉及到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第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的《壮族音乐史》（范西姆、赵毅 1998）、《瑶族音乐史》（苏沙宁、杨秀昭、何洪 1998）、《仫佬族音乐史》（杨秀昭、何洪 1998）、《毛南族音乐史》（傅湘仙 1998）、《京族音乐史》（卢克刚 1998）、《侗族音乐史》（普虹 1998）等，在这些民族音乐的史学性研究中，也论述了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发展史。

三是全国或某几个省区的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研究包含有广西特色乐器及其音乐。比如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6），广西学者杨秀昭、何洪、卢克刚从始至终都参加其编撰工作，对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民间乐器与器乐均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再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民间乐器概论》（杨秀昭、卢克刚 1992、1993）、《中国自由簧类乐器综合论》（卢克刚 1994）、《中国单簧类乐器考辨及改良探讨》（卢克刚 1994）等研究成果，广西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在其中均占有相当份量。

四是广西民族民间乐器与器乐的专题性研究包含有特色乐器及其音乐。其研究成果，可细分三类：首先是乐器学的研究，如《独弦琴的发声原理及其二声部探究》（卢克刚、何洪、杨秀昭 1984）、《瑶族民间乐器》（何洪、杨秀昭、卢克刚 1986）、《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叶青 1989）、《竹筒琴纵横谈》（何洪 1994）、《混合发音体——竹筒琴发音机理探究》（苏沙宁 1995）、《京族独弦琴的制造和演奏》（黄全 1998）、《壮族乐器》（杨秀昭 2000）、《鼻笛探赜》（苏沙宁 2003）、《广西本土箫笛纵横谈》（赵焕春 2006）等，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广西各民族民间乐器的名称（自称、他称）及其语言学上的含义，乐器的历史沿革、形制构造、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发音原理、定弦（或简）音、音律、音区音域、演奏技法、表现性能，代表性艺人、代表性曲目及其习用场合、文化内涵等等，均作了深入研究。其次是民族民间乐器的史学性研究，如《广西几种民族弦乐器初考》（陈驹 1984）、《壮族蜂鼓和瑶族长鼓渊源考》（陈驹 1984）、《我国京族独弦瓢琴源流考辨》（陈驹 1986）、《壮族蜂鼓的沿革、形式、特色和发展》（韦世良 1989）、《壮族器乐发展源流综述》（郑超雄 1991）、《从 Zamr 类乐器的东渐探中国对阿拉伯音乐的吸收和改造》（杨秀昭、何洪、卢克刚 1991）、《苗族芦笙起源浅谈》（戴进权 1992）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相关乐器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轨迹。再次是民间器乐的研究，如《骨胡与壮族八音》（苏沙宁 1991）、《铜鼓乐论》（何洪 1994）、《壮族铜鼓音乐及其音乐艺术的历史与现状思考》（苏沙宁 1996）、《广西壮族八音初探》（覃式 1997）、《广西少数民族“八音”考》（卢克刚 2005）、《融水苗族芦笙乐研究》（朱伟芳 2001）、《广西芦笙乐论》（杨秀昭 2005）等，分别展示了广西民族民间代表性乐种的基本状貌与艺术特色。第四是有关民族民间乐器的改良与推广的研究，如《乐改思考》（何洪 1993）、《牛腿琴改良思考》（陈坤鹏 2003）、《论侗笛的改良与推广》（赵焕春 2003）、《独弦琴教程》（陈坤鹏 2004）、《独弦琴的改良与推广》（陈坤鹏 2006）等，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和切实可行的建言。第五是民族民间乐器文化学的研究，如《瑶族长鼓文化现象之我见》（韩德明 1995）、《瑶族长鼓产生、完善过程中的人文意识》（钟泽骐、韩德明 1997）、《千言万语难诉笙歌情——融水“十三坡”芦笙节综述》（陈艳霞 1998）、《人类学视野中的广西少数民族